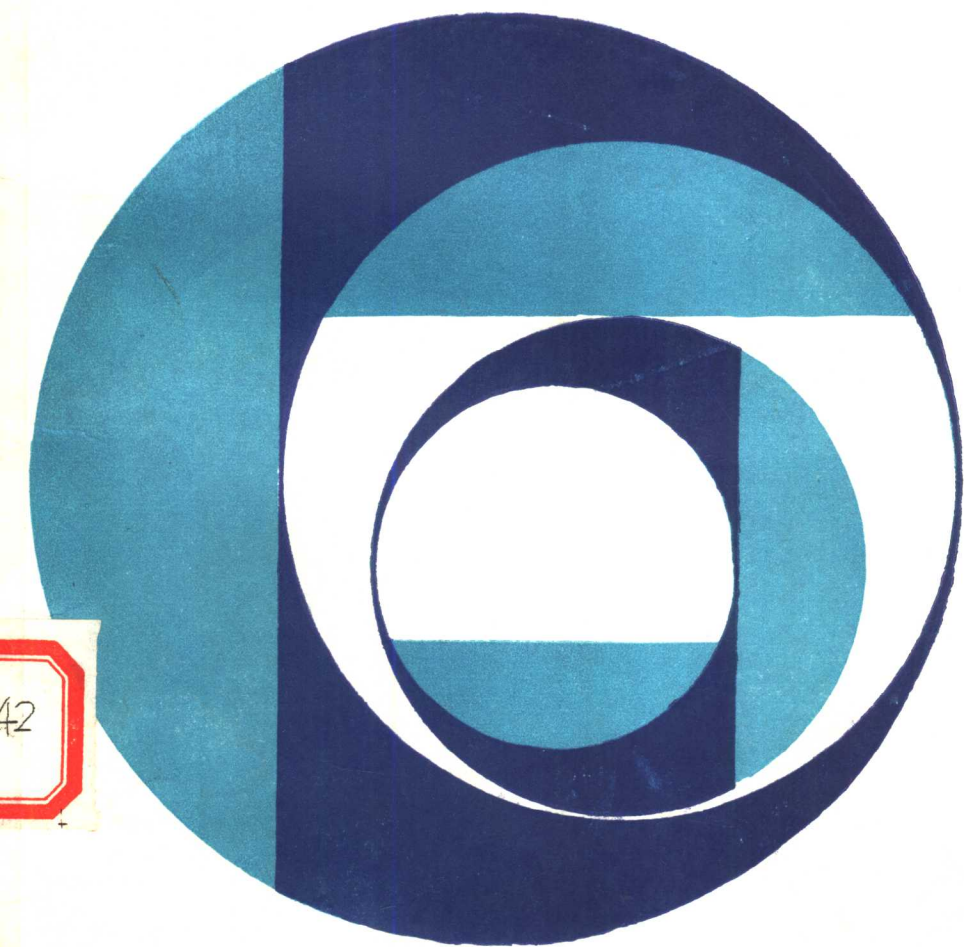


新聞叢書 8

白頭記者話當年

夏 衍著
重 慶 出 版 社



42



白头记者话当年

夏 衍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特约编辑：阎焕书

责任编辑：何鸿钧

封面设计：秦伟林

白头记者话当年

夏衍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09千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书号：7114·483

定价：1.25元

出版说明

为了给新闻学的研究提供资料，给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参考材料，我们计划陆续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一套《新闻丛书》。

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半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丛书内容的一部分是现在写的当年回忆或追述，包括新闻战线各个方面的人或事，其间容或有不很切实之处，看法亦各自殊异；另一些资料则是几十年前在白区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现在看来，其中某些观点、论述或提法，难免有欠妥之处，但为保持其本来面目，我们均一律未予改动。

《新闻丛书》前言

《新闻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继《新闻研究资料》后的又一套有关新闻方面的书籍。它是《新闻研究资料》的姊妹读物。

《新闻研究资料》自1979年8月创刊以来，历时三年。到今年年底，共出版了十六辑，330多万字。这是进行新闻研究工作和学习新闻工作经验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有一批党的、进步的报纸和新闻团体的史料；有一批新闻界著名人物的史料；有一批革命前辈办报活动和办报经验的史料；有一批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具有影响的报纸的史料，等等。所有这些材料，都为《新闻丛书》的编选工作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我们依据这些材料，按照不同的选题，经过补充修订、增添内容，使它成为一本本内容充实丰富的专题著作。

此外，我们在编辑《新闻研究资料》的工作中，访问过许多新闻界的老年、中年和青年同志，其中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新闻界前辈，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回忆录；有积累了很多有价值资料的报刊史研究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编写专题史料；有对新闻采访、编辑、副刊编辑具有经验的记者、编辑，他们将为这套丛书写出有声有色的经验体会；有对新闻学作过深入探讨的研究工作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专门著作。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这套《新闻丛书》的选题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还将进一步广泛地约请新闻、文

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为这套丛书、为《新闻研究资料》丛刊撰写文章和著作。

我国的新闻历史悠久，新闻实践丰富，但新闻理论工作却显得薄弱。还没有引起新闻界本身应有的重视。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和促进新闻史料的积累、新闻实践的总结和新闻理论的研究。总的说，是为了我国新闻学的繁荣和发展。

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为了我国新闻事业的提高和发展，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并在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我们欢迎新闻、文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批评和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第一辑 记者生涯的回忆

一、记《救亡日报》.....	(1)
二、记香港《华商报》.....	(41)
三、记重庆《新华日报》.....	(57)
四、记《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79)

第二辑 报刊言论选

(按报纸归类,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一、《救亡日报》	
对国联大会的期待.....	(95)
捷克会做奥地利第二吗?	(97)
悼经子渊先生.....	(99)
论字垣与板垣的内哄.....	(100)
论新阶段的宣传工作.....	(102)
再论新阶段的宣传工作.....	(104)
当心英国!	
——对第二次慕尼黑的警戒.....	(107)
重整我们的金融机构.....	(108)

希望与现实

——再论二次欧战的性质…………… (110)

到反侵略战争的路

——三论二次欧战的性质…………… (112)

矛盾反复和加深

——美国黄金潮的前瞻…………… (114)

上升与降落

——日寇的“黑暗的冬天”…………… (116)

加强面的包围

——消灭敌人的点和线…………… (118)

争地之战与争民之战…………… (120)

勸日本反战同志

——七十五议会与反战同盟…………… (122)

倍立厦事件与英国…………… (124)

破难船在怒海中

——米内内阁到何处去…………… (125)

战神在多瑙河上散步

——巴尔干协商国会议之后…………… (127)

近东暴风雨的前夕…………… (128)

完成蔡子民先生的遗志 在民主

的旗下团结起来…………… (130)

虎与伥的双簧

——“经济提携”与物资掠夺…………… (132)

用脓毒来比拟迂逆…………… (133)

世界在巨变中

——德国侵入荷比之后…………… (135)

游资归来!…………… (137)

祝福西大别山的英雄.....	(138)
读张伯伦去职之辞.....	(140)
西线鸟瞰.....	(142)
论欧洲的战略形势(上).....	(144)
论欧洲的战略形势(下).....	(145)
启日寇之蒙.....	(147)
从第五纵队说起.....	(149)
近卫“事务官”内阁.....	(151)
二、香港《华商报》	
“妇运要旨”.....	(153)
鸡犬以下.....	(154)
冷淡.....	(155)
打破二十世纪的巴斯蒂	
——纪念法国大革命.....	(156)
失望含羞之后.....	(157)
不能征服的.....	(159)
“汪精卫转”.....	(160)
义与利.....	(161)
青年自救.....	(162)
“答客问”书后.....	(163)
“是，是”报.....	(165)
中苏文化交流.....	(166)
希特勒与拿破仑.....	(167)
海尔巴哈以下.....	(168)
狗亦不易为.....	(169)
小希特勒的狂想曲.....	(170)
该应景文有感.....	(171)

西门庆的悲剧·····	(172)
□□打狗精神	
——纪念鲁迅先生·····	(173)
譬喻·····	(174)
论晦暗·····	(175)
从“敬老”到“反老”·····	(176)
秃驴的诡辩·····	(177)
垂钓之道·····	(179)
“国体明征”·····	(180)
论骗术·····	(181)
媚妓相(二题)·····	(182)
想起了费正清先生·····	(183)
“牛”的教训·····	(185)
港九不致收回论·····	(186)
造谣者自毙矣·····	(187)
破绽与奇闻·····	(188)
中国事，类如此·····	(189)
人民的预感·····	(190)
鼠年谈鼠·····	(191)
“起用宿将”·····	(192)
发疯与做梦·····	(193)
美国的“新闻自由”·····	(194)
战争哪一年结束的？·····	(195)
化妆师的技穷·····	(197)
“家伙们”醒了没有？·····	(198)
今《桃花扇》·····	(199)
拆穿了“真相”·····	(200)

宁国府的气数.....	(201)
蒋式“大捷”.....	(202)
人心如此.....	(203)
三、重庆《新华日报》	
望穿了西方的地平线.....	(205)
对敌人不能宽容.....	(206)
光从北方来.....	(207)
我们信任人民的力量.....	(210)
尊重这第一章第一页.....	(212)
向法西斯的巢穴进军	
——自六月十七日至三十日.....	(213)
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	
——自七月一日至十四日.....	(219)
黎明之前的设计.....	(225)
——自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一日	
在胜利的激动中.....	(230)
——自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	
新邻人与旧恶汉.....	(236)
日本民主阵线的胎动.....	(237)
四、《建国日报》	
复刊之辞.....	(246)
我们应有的警惕.....	(248)
认清世界现势的主流.....	(249)

附录:

夏衍的报刊活动及其报刊言论浅谈

.....	高 宁 (252)
-------	-------------

第一辑 记者生涯的回忆

一、记《救亡日报》

(一) 上海创刊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到重庆进了《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出了十二天，被国民党封闭；接着我去新加坡，参加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在那里干了七、八个月，我重返香港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这十二年的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其中《救亡日报》被国民党禁止出版，前后共两次，因为所在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发生的停刊事件有两次。但是尽管环境艰难，国民党的文网很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现在，先谈一点《救亡日报》的情况。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上海文救”）的机关报，每天出四开一张。这张报最初是打算由“上海文救”单独办的。但是在筹备期间，发生了——也可以说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再加上这时候郭沫若同志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上海文救”也成为有国民党人士参

加的统一战线的团体，因此这张报也就有国民党人士参加了。这一点现在只有很少人知道。因为在郭沫若回到上海之前，也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宣布国共合作的消息之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虽然不敢对声势浩大的“上海文救”公开迫害，但是采取敌对态度，不予合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上海文救”在南市开会欢迎郭沫若归国的时候，上海市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还召集了一些流氓特务来捣乱。但不久周恩来同志在庐山和蒋介石谈定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继而在上海又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方面，最初是以潘公展为首，反对“上海文救”出机关报的，这时候迫于形势才改为挤进“上海文救”，要对这张报纸插上一手。记得在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约我到郭沫若的寓所去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郭、潘两人已经约好到浦东大楼（“上海文救”所在地）和潘公展谈判合作办《救亡日报》的事情。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决定要我协助郭沫若办这一张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我们三人到了浦东大楼潘公展的办公室，寒暄了一阵之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说，现在沫若先生回来了，那么这张报纸就请郭先生当社长。表面看来他似乎很慷慨，事实上这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也就是“上海文救”主要负责人和群众所公推的，而潘公展自己也知道无法抗拒，因此乐得表示一下慷慨。他接着说，既然是国共合作来办，那么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郭沫若表示同意，并立即根据我党的决定，提出我方由夏衍任总编辑。潘公展看来已经有了准备，说他想请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任总编辑，接着他又提了要由汪馥泉任编辑部主任，由周寒梅任经理，此外还派了一个叫张镛的当了干事。当时郭沫若和潘汉年对其他人事没有预先商定，因此说，我方的编辑主任、副经理以及其他工作

人员都由社长来决定。至于经费，因为国民党方面估计这张报纸办不长，所以平常装得气派很大的潘公展，这时候吞吞吐吐地讲，他们先出五百元办起来再说。接着潘汉年表示，那么我们也出五百元。这就是国共合作办《救亡日报》的第一次会谈。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包括潘公展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官吏，还摸不透蒋介石对于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所以当天尽管相互戒备，但是潘公展的态度显然有了点变化。他在不久之前还派上海滑稽演员刘春山等一批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的大会，他本人对郭沫若连招呼都不打的，可是这一次却似乎很客气了。最后他还说：就这样谈定了，以后如有经济、发行等困难，我们再谈；报社的事情，例如要哪些人当记者，哪些人管发行，都请郭先生决定，没有太大的事情，我就不参加讨论了。这样除国民党派定的樊仲云等人之外，其余的记者以及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由郭沫若和我安排决定。当时林林同志要对付汪馥泉，担任实际的编辑主任；专业记者只有周钢鸣和彭启一。其他则由“上海文救”的成员自动供稿。初办时，每天到社办公的，除上述几个人之外，还有叶文津、姚潜修、郁风等。特别要提出的是，钱杏邨同志以文救宣传委员的身份，也几乎每天来报社参加工作。我们同意潘公展推荐的樊仲云、汪馥泉、周寒梅等人，有一些具体原因：樊仲云我过去认识，他不是办报的人，也不是有经验的反共分子；至于汪馥泉，那是我中学同学，五四运动时，他也参加过《浙江新潮》，他还在国共第一次分裂以后，在上海帮陈望道先生办过大江书铺，也替中间的一些杂志写过文章，这个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见解。因此，潘公展派这些人来参加《救亡日报》的工作，他也明白自己这边在版面和文字方面处于劣势，他最多通过亲信周寒梅从经济上、发行上来扼杀我们，使我们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大家知道，当时上海有十多家大报，几十家小报，在这种情

况下，出一张既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闻的报纸，要存在下去很不容易。因此，我们的作法是：一方面与潘公展合作，利用他的名义争取公开合法；一方面控制编辑大权，不让他们插手。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潘公展除了用周寒梅在发行、印刷方面捣些乱之外，在编辑、言论方面没有起多大作用。

这份报纸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创刊。当时全社不过十来个人，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写稿不取稿费，甚至于到报社办公的交通费也由自己负担。我们的依靠，是当时参加“上海文救”的绝大部分进步文化工作者。所有当时在上海的知名进步人士，首先是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等，此外，还有文学界、戏剧界、社会科学界、电影界的各方面人士，都替我们写稿，甚至自愿替我们奔走采访消息，有的还替我们跟报贩打交道，劝说他们帮助这份在上海很难打开局面的正派报纸。

当时正是沪战最激烈的时刻，在前线的几个国民党将领都是郭沫若在武汉北伐时期的同事，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首先来访问郭社长，表示支持，并订了上百份《救亡日报》到前线去散发，同时还似乎很诚恳地请郭社长替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担任宣传慰劳和救济难民的工作。当时经组织上同意，郭沫若同志答应了他的要求，组织了以杜国庠等三人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每团二、三十人，成员完全由郭沫若决定。有一个团本来由我担任团长，但后来沪战告急，郭沫若征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决定在上海沦陷后把《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出版，继续由我负责，因此让左洪涛代替我担任了团长。在这个时期，田汉同志也从南京到了上海，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一到上海，就几乎每天带着他所熟悉的人慰问伤兵，救济难民，还同郭沫若和我不止一次地到张发奎、罗卓英的司令部去劳军。他是一位酒豪，又是才思敏捷的诗人，一到这些司令部，酒罢纵谈之余，当场挥毫赋诗，来

慰劳前线将士。回到上海，他还到大陆商场《救亡日报》的编辑部来写慰问文章，写当天的报道。有一次国民党空军来轰炸驻在黄浦江对面的日本“出云舰”，正值田汉在大陆商场我们编辑部。目击此举，他立即提笔写了一篇关于日本海军，特别是关于“出云舰”的详尽报道，得到了读者的很大好评。

国民党派到《救亡日报》的樊仲云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只在出版后几天，每晚八九点钟到大陆商场的编辑部来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务。很显然，他对抗战没有信心。汪馥泉倒是每天来办公，他要求供应他来回的路费，要求给他点香烟和茶叶等等，我们都依从了他。至于周寒梅，那是个进行破坏的幕后人物。他每天早晨到报社一次，向报贩收报费，然后对我说，今天销了多少份，卖了多少钱，这样办下去，一千块钱肯定会很快赔完的等等，借此来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并不气馁，只是在出版了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周寒梅的破坏，担任出版、印刷、排字的工厂要求增加印刷费，为了换印刷所，停刊了七天，以后又继续出版了。当时上海已经很危急了，日本军队包围了市区，直迫南市，我们的记者进出都很困难，这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也可以说是出于意料之中吧，两党筹措的一千元已经告罄。我们没有再向潘公展要钱，而报纸仍然出版下去，这就使周寒梅对报纸失去了控制权，他要想继续担任向报贩收钱、向印刷所交钱的职务，就非得向潘公展要钱不可，而这是他办不到的。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尽管被上海的外文报纸说成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是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除了前面讲过的经济问题以外，由于报头是郭沫若同志写的，下面又写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因此出版之后，不到两天，樊仲云就通过汪馥泉问我，是否应按“协议”在总编辑名字后面，再加上樊仲云的名字，这遭到了我们的拒绝。因为实际

上他并没有担任工作。而且，汪馥泉也不敢公开把这件事情向郭社长提出，因此我们置之不理，他也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樊仲云再也不到《救亡日报》来了。

在上海，《救亡日报》形式上和一般小报相同，但内容上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而是专靠特写、评论、实际采访以及文艺作品为内容的报纸，要在上海这个地方站住脚，困难确实很多。上海的报贩是一个相当厉害的组织，它不卖你的报，它不替你发报，你就无法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最初，那个报贩头子对我们《救亡日报》是毫无兴趣的。我和汪馥泉第一次同他（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谈判，那人简直不相信这张报纸能出一个星期；关于销数，他说能销到五百份已经很费劲了。但是，出乎报贩头子的意料，这张报纸一出版，由于坚持团结抗日的旗帜和方向，有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实际的战地采访，不讲假话，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而且把日本占领上海后可能发生的祸乱告诉大家，希望人民群众有一定的精神准备，因此《救亡日报》尽管处境困难，每天仍能销到一千份以上，最多的时候能销到三千五百多份。《救亡日报》是在上海激战之际开办的，因此，“上海文救”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郭沫若同志，天天忙得不可开交。那时，每天到报社办公的人，只有钱杏邨、林林、我以及两个固定的记者。当然，来我们这里义务帮忙的人，还有很多。偶然有事要办，而人手不足，打个电话给“上海文救”，他们就会派人来帮忙。这个时期，汪馥泉每天还来办公，也写点文章，没有什么反共的表演。到了上海沦陷的前夕，我们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主要是商量哪些人到广州去，以及到那样一个我们大半都感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地方去办报，应该做些什么准备。我们还定了谁去广州，谁留上海。当报纸要转移到广州去出版的决定一传开，几乎全报社的人都要求跟着一起去广州，但是《救亡日报》